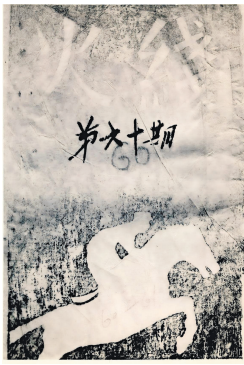


《火线》与红军长征纪事

于森



红军长征期间,天津作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依靠报刊舆论、学生运动及情报工作等持续开展革命活动,在北方党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座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天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1930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顺直省委改建为河北省委,领导河北、北平、天津及北方广大地区的革命斗争,省委机关设在天津。从1930年12月至1938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先接办了《北方红旗》,后创办了《北方红旗小报》和《火线》等重要报刊。其中,《火线》创办于1933年3月,共出版97期,是中共河北省委出版时间最长、期数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刊物,主要刊登中共中央、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文件、信函、工作交流、各地党的工作等内容。

在红军长征初期,党中央在部署战略转移的同时,制定北上抗日的路线方针,发表北上抗日宣言,同时指示各地党组织积极配合红军北上行动,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1934年10月,《火线》对稿件编排次序进行了调整,显著加大了对党中央与苏区相关信息的报道比重,同时进一步充实河北地方党的形势分析内容,并在主要栏目“通讯”一栏中设置“红军快讯”,以简报形式分多期报道红军北上战况。随着长征进程的推进,《火线》持续跟进红军动态,如1936年8月第60期“红军捷报”刊载《援助红军北上会合 武装保卫绥东华北》、同年9月第61期“火线情报”刊载《十万红军已抵甘境》等,使包括天津、北平、唐山等华北地区的党组织及进步学生、群众及时了解红军主力的作战情况,给北方广大地区党组织和各阶层爱国群众以极大鼓舞,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推进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8月,《火线》第44期“苏区讯息”刊载红军长征行军捷报,报道了红军向西向北推进的军事行动。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而此时,整个华北地区正处于深重的危机之中。为进一步染指华北,日本军国主义者在1935年五、六月间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要求国民政府撤退驻守河北的军队,撤换河北省政府主席及天津、北平市长,制止中国的一切抗日运动等;同年下半年,又阴谋策划“华北自治”。

华北危机步步加深,国民党当局一味妥协退让,激起了广大民众特别是进步青年的愤懑与抗议。1935年9月17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开学典礼上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燃起了师生的爱国斗志。在此背景下,天津党组织按照中共临时中央局《关于最近北平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通知要求,积极在青年学生及各界群众中开展工作,先后在南开大学、北洋工学院、河北工学院、扶轮中学、南开中学等十几所学校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为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同时,杨秀峰、黄松龄、温健公、阮慕韩、闻永之、何松亭等一些党员知识分子按照党的指示,以教授的身份为掩护,在青年学生和教职工中开展工作,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宣传抗日救国,发起成立了“经济学会”“政治学会”“时事座谈会”等组织。在他们的积极引导下,越来越多的进步师生了解到《八一宣言》及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为处于危机及困境中的天津党员和广大群众点亮了前进的道路。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天津爱国学生随即响应。12月18日上午,天津法商学院、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南开中学等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发起了大规模抗日示威游行,进一步扩大了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春,刘少奇受党中央的委派来到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指导工作,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具体指导中共河北省委的工作。刘少奇到天津后,在《火线》上发表多篇文章、报告,详细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同年5月,刘少奇指示天津市委组织全市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举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增兵华北和屠杀我同胞的“五二八”游行示威。为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天津市委要求学联和民先队在暑假期间组织广大青年学生走向社会,在群众中更加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天津学联召集各大中学校代表成立“暑期义务教育促进会”,在市郊的王兰庄、小园和姜井等村开展“义教”,将教授读书识字同抗日爱国宣传结合起来,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及红军的英雄事迹,使广大贫苦农民从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在参加“义教”活动的学生中,有很多人以红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相互勉励,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在党的领导下,“义教”学生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在朝夕相处中加深了解,逐步学会了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据曾在王兰庄参加“义教”的北洋大学学生徐达本回忆,同学们以“向红军艰苦奋斗精神学习”相互激励,不少人在暑期或之后先后入了党,成长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积累了坚实的干部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火线》在国民党文化统制和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双重封锁下,通过一页页油印的书页传递出坚不可摧的红色力量,承载着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力量和精神至今仍鼓舞着我们继续前行。

题图:《火线》第60期封面

90 长征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索尔兹伯里把中国红军的长征放在世界和人类历史前进的大趋势中去观察与思考,并与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俄国十月革命进行了比较,得出一个结论:“1934年的长征不仅仅是象征。中国红军的男女战士用毅力、勇气和实力书写了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他要搞清楚红军为何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履险如夷地从蒋介石的手掌心里走了出来。索氏说,“在我们这个世纪中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也没有什么事件像它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

在这次踏访中,索尔兹伯里带着疑问采访,试图寻求他想要的答案。从遵义启程,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的故事使他甚为感动,在行驶的面包车上,他对秦兴汉说,当时差不多各国都支援蒋介石,兵力武器都比红军强,但就是消灭不了红军,不可思议。看来,国民党将领腐败无能,红军指战员聪明能干。秦兴汉告诉他,主要是红军有了正确的领导。

索尔兹伯里沿路一直思索,红军在万里长征中,同强大的国民党敌人战斗,同恶劣的自然极限搏斗,还要同内部的错误路线斗争,被迫进行转移,却是胜利的结局。秦兴汉察觉,索尔兹伯里从采访中体会到,红军的理想、智慧、毅力、纪律、政策等也会转化为战斗力,一个有理想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后来,索尔兹伯里的认识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明白了个根本的道理:得人民者赢得天下,失人民者丢掉天下。”秦兴汉在2008年出版的《让世界都知道红军长征:陪同索尔兹伯里踏访长征路》一书中回忆道。

有的外国人在谈到红军长征时,常常误以为长征伊始就拟定了北上陕北的计划,是一次有目的的行动。索尔兹伯里在访问中了解和关注的重点却是——在蒋军强红军弱和自然条件极差的状况下红军如何取得胜利。他确信,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曾多次改变落脚点,最后从一张报纸的消息中,知晓了陕北红军和敌人的最新情况,下决心把落脚点定到陕北,毛泽东领导红军的战略战术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依据形势条件的变化而随时调整改变自己的方针,这正是红军高明之处,也是取得长征胜利的原因所在。

“世界权力转移的见证人”

1985年10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由美国哈珀与罗出版公司出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拥有了为数众多的读者,该书还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及许多小国翻印出版,在全世界广为传播,“被认为相当真切地接近了红军长征的历史本来面目”(秦兴汉语)。1986年5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由过家鼎、程镇球和张援远合译的该书中文版,索尔兹伯里在自序中说,人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他们仅仅从统计数字中就开始明白红军所作出的牺牲有多么重大——一九三四年十月,八万六千名男女从江西出发,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的这支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时只剩下大约六千人”。

陪伴、见证文夫索尔兹伯里寻访长征全程的夏洛特,1986年在纽约出版其著作《长征日记——中国史诗》,翌年中文版面世,她写道:“从事伟大的冒险的经历,对事实和真理的探索,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现在理解到:长征如何鼓舞着中国人中年轻的一代,他们要怎样生活才无愧于那些英雄,使英雄们的精神永葆青春。长征区分了善与恶,区分哪些人是要为国出力,哪些人要的仅仅是权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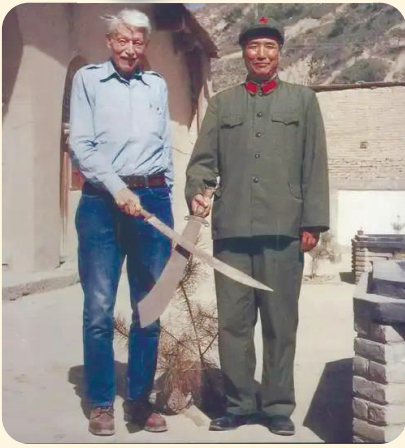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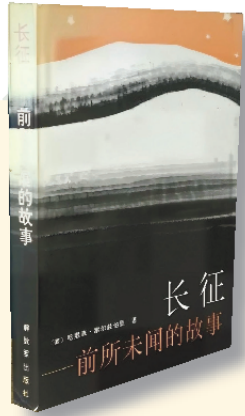
1992年,索尔兹伯里病倒了,患病前两个月,他写信给中国友人:“我这次去中国要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沿着邓小平南巡的路线走一走。”他梦想着续写中国的新长征。他在《万里长征寻迹》中充满深情地写道:“我自认仍然是个浪漫主义者,但不仅如此。我进行这番长而又长的奋斗,经过种种曲折,并不只是为了冒险。当时我就相信(现在一样),世界的未来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将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就是世界权力转移的见证人。”

1993年7月5日,索尔兹伯里在与夏洛特驾车旅行途中不幸病故,夏洛特后来将文夫在重走长征路上使用过的心脏起搏器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如今人们每读索尔兹伯里这部再现长征历程之作,仿佛能感受到他的心脏依然在跳动。

让世界读懂中国红军长征

——索尔兹伯里和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陈杰



1984年6月8日,在红一方面军长征终点——陕北吴起镇,索尔兹伯里(左)与秦兴汉拿起红军用过的大刀合影留念。

“总有一天会全部写下来”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通过他风行各国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此书1937年10月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1938年又在英国出版,几十万美国人,包括时任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读了这本书,从中得到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最初印象。1938年2月,《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上海以“复社”名义刊印,传世至今。

二战期间,作为战地记者的索尔兹伯里见到斯诺,二人都在苏联报道苏联红军如何击退希特勒的部队。斯诺和索尔兹伯里一起上前线,常常谈到中国,这加深了后者对中国红军长征的兴趣,不禁为之向往。合众国际社本来要索尔兹伯里结束在莫斯科的报道任务后即动身去中国重庆。不料,时势与计划变了。1984年,当索尔兹伯里跋涉在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路上时,常常回想起多年前埋藏在心底的那个夙愿。

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五篇“长征”中“过大草地”一节写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他曾希望自己来写,但未能如愿便与世长辞。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之间的敌对情绪开始消融,美国人又可以前往中国旅行,索尔兹伯里下了决心:如有可能,一定要实现斯诺的遗愿,争取写出长征的全过程。此时,索尔兹伯里已名列美国最杰出的记者行列,其代表作《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蜚声文坛,1972年至1974年出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自称“天下风云一报人”。而1985年问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正是索尔兹伯里渴望实现斯诺未竟目标的作品。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是第一部由外国人亲身重走长征路、实地采访亲历者后撰写的系统反映中国红军长征全景的著作。索尔兹伯里自信能发现1936年斯诺不曾发现过的内容,还曾重复斯诺就红军“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的话——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索尔兹伯里说,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直到弄清事实为止”

1972年,索尔兹伯里首次来华,向周恩来总理正式提出重走长征路设想,之后十余年,他与生在中国成都、曾任美国驻华外交官的“中国通”谢伟思经常讨论这一行动计划。1944年7月,谢伟思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飞赴延安,访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央领袖、红军将领。1977年,索尔兹伯里与夫人、作家夏洛特游历中国周边地区——从东南亚饱经战祸的丛林到蒙古的沙漠再到幽暗的阿穆尔河边——行程数千英里,1980年又沿着中国西北大漠前行,为一生最重要的旅程做坚韧的准备。1983年8月17日,索尔兹伯里接到中方的电话,欢迎他在重走长征路上写长征。

1984年3月,索尔兹伯里与夏洛特飞到北京,采访中国老一辈领导人、老红军、党史军史专家。4月至6月,76岁的索尔兹伯里,70岁的夏洛特、75岁的谢伟思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译员张援远的陪同下,几乎完全沿着红军第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行进,途中涉足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和第四方面军战斗过的部分地区,经江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六省,历时74天。索尔兹伯里身上有着如红军战士一般的刚强与坚毅,他不顾年高且装着心脏起搏器,随身带着与斯诺采访苏德战争时用过的雷米塔牌打字机,越过千山万水,完成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最惊险的考验出现在会理金沙江畔。由于长时间在

津派文化大家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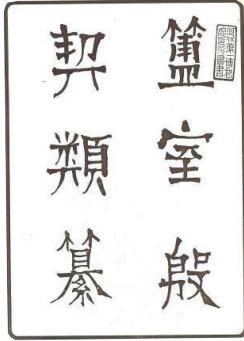
甲骨文与天津(六)

中国甲骨学史上第一部甲骨文字典

朱彦民



沽上丛话



王襄《筭室殷契类纂》书影

天津著名学者王襄先生不仅是殷墟甲骨早期的发现与鉴定者,也是一位集甲骨收藏与甲骨学研究于一身的著名甲骨学家。艰苦卓绝的甲骨收藏经历、苦心孤诣的甲骨学研究和编著的甲骨学名著《筭室殷契类纂》《筭室殷契征文》,都是王襄先生对甲骨学体系建立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为他带来了崇高的学术荣誉,从而奠定了其在甲骨学史上较高的学术地位。

上述两部名著中,集字释与字典为一身的《筭室殷契类纂》,是中国甲骨学史上第一部甲骨文具书。

王襄自1898年起鉴定、搜集殷墟甲骨,甲骨文字研究成为他毕生治学的重点。1904年,28岁的王襄开始释读甲骨文,历经十余年积累,于1918年完成《类纂》初稿。

1920年12月,《类纂》由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石印出版,线装两册。书前包含自序,王守恂与华石斧所作书后,全书分为正编、重文、附编、存疑、待考等章节,共收甲骨文单字2867字。彼时,王襄正在南方盐务岗位任职,书稿的刊印,全靠供职于前述博物院的好友俞祖鑫鼎力协助,王襄将初稿寄给他,由其操劳完成石印工作。

初版刊行之后,王襄持续开展甲骨研究不断产生新的考释见解。1927年至1928年,他在四川三台以及回天津休假期间,对全书加以校订,新辨

识、勘误文字27个,增补异文11个。耗费三个月誊写完整稿后,1929年10月,增订再版本依旧由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印行。1988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了影印本。

《类纂》体例宏大,内容丰富,是甲骨学早期核心著作,兼具释读与字典功能。全书框架分为“正编”十四卷、“附编”一卷、“存疑”十四卷、“待考”一卷。初印本“正编”收录《说文》可识文字873个,重文2110个;“附编”收录合文243个,重文98个;“存疑”收录《说文》不见、难以确认的文字1852个;“待考”收录存疑文字142个。重订本“正编”收字957个,“存疑”“待考”合计收1808字,新增补录11字,前增加一篇后序。

以重订本为例,全书第一册包含初印本自序、重订本自序、王守恂与华石斧所作书后,以及“正编”卷一至卷七。作为王襄老师的王守恂先生在书后感慨甲骨文在乱世出土的时代际遇,认为商代甲骨的现世,为国人追溯文字本源提供了宝贵实物。津门前辈学人华石斧先生则总结了本书四大突出长处:第一,原样录入甲骨原文,后世可以直接依据文本复核原始材料,摆脱历代传抄带来的讹误;第二,专门设立合文专篇,揭示商代文字书写体例,破解古文阅读的旧有谜题,为金石古籍研究提供新方法;第三,区分正编、存疑、待考,“正编”考释标准严格,“存疑”广录疑似文字,留给学

界继续考证,便于学界共同推进研究,减少门户之争;第四,甲骨出土后损毁速度很快,该书以实物、拓本为依据汇集文字,保存大批即将消亡的甲骨资料,打通上古文字到篆籀文字的链条,为文字溯源研究提供珍贵材料。

全书第一册“正编”卷一至卷七,收录祭祀、器物、方位、天象、行走、言语、鸟兽、饮食、草木、地理、时日、居室、疾病类大量甲骨文字。第二册包含“正编”卷八至卷十四以及“附编”,继续收录人伦、身体、山川、野兽、车马、水火、天象、兵器、女性相关等各类甲骨文字。“附编”所收甲骨文字合文,包括祖先名字、数字、时间名词、成语等词语的合文写法。第三册为“存疑”卷一至卷七。第四册包括“存疑”卷八至卷十四,以及“待考”“勘误”。

在王襄出版《类纂》之前,甲骨文考释著作,只有孙诒让《契文举例》、罗振玉《殷虚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等几种,所以此时编纂甲骨文字典根本没有可以参考的范本,筭路蓝缕,以启山林,故其发凡例、规模格局的原创功劳,自然是非同寻常的,值得大书特书。

《类纂》作为我国第一部甲骨文字典,汇集当时所见甲骨文字及其考释成果,明确区分甲骨文考释中已识、待识、存疑之不同,分门别类进行梳理、编排,建立起早期甲骨文字整理的编纂范式。

其一,全书以《说文解字》部首顺序排列,检索极为方便。此后的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孙海波《甲骨文编》和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等较有影响的甲骨文字典工具书,大都受王氏《类纂》的影响,采取了以《说文》部首排列顺序的编辑方法。

其二,《类纂》在每一辞条下既有考释文字,又于每字之下临写卜辞整句原文,便于读者了解该字在卜辞中的位置和意义,使读者既能了解甲骨文字的结构特点,又便于探究该字的卜辞所记载和所反映的商代社会历史内容。此后,日本学者岛邦男编著《殷墟卜辞综类》、徐中舒先生主编《甲骨文字典》,也是在考释文字之下列出卜辞原句,都是受王襄《筭室殷契类纂》的影响。

其三,《类纂》非常有创意地将甲骨文中的合文单独编篇为“附编”,凡二百四十三文,重九十八文。合文是古文字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占据一个字的位置,称为合文。王襄这样将甲骨文合文进行集中分类编排,属于首创。后来的甲骨文具书,多受此影响进行编排。

其四,《类纂》除了“正编”“附编”之外,还有“存疑”和“待考”两部分。凡能考释的字而为《说文》所有的字,编入“正编”;《说文》所无及稍有所知或难以识读者,取其偏旁类似者次之为“存疑”;完全不能识别的字列入“待考”,留待古文字学者今后进一步作深入研究。这样做不仅对文字释读的

不同层次做了清楚交代,也为后来的学者进一步进行考释提供了方便,而且更彰显了作者治学所秉承的实事求是、审慎阙疑的严谨态度。

总之,《类纂》在甲骨出土不久、资料容易散佚损毁的时代,系统著录大量文字材料,较为全面地汇集保存了甲骨文字考释成果,给后世甲骨考释提供重要参考,是甲骨学发展早期里程碑式的成果。《类纂》的编纂,就犹如现代字典的编排,具有科学性和开创性,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编纂体例大多为后来的甲骨文字工具书所仿照和继承。

正因为如此,《类纂》受到了甲骨学界的普遍尊崇与高度评价。比如著名甲骨学家陈梦家著《殷虚书契总论》称《类纂》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创造性的字汇”;著名甲骨学综论性著作《甲骨学通论》(王宇信著)对王襄此书的评价,应该说代表了学术界的共识:“首先,《筭室殷契类纂》是甲骨学史上的第一部字汇……《筭室殷契类纂》一书所开创的这一编辑体例,对后世大型工具书的编纂有一定的影响。”

《类纂》至今仍是甲骨学界追踪早期甲骨文考释历史时离不开的甲骨文字典。

满庭芳